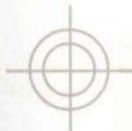


廉
政
哲
思
录

廉政哲思录

孙忠诚 ◇ 著



形形色色的案件，
各式各样的腐败分子……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了腐败道路？
又如何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廉政哲思录

孙忠诚 ◇ 著

形形色色的案件，
各式各样的腐败分子……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了腐败道路？
又如何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廉政哲思录/孙忠诚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35-5105-5

I. 廉… II. 孙… III. 廉政建设—案例—中国
IV. 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076 号

廉政哲思录

责任编辑 曲 炜 王 瑛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 dxcbs. 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大学印刷厂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25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绪 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直强调不论是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搞腐败就坚决查处，绝不手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课上，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召集 8 位在各自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他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从严治党，惩治

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在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他指出，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习近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牢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道理，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在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中共十八大过去不久，中央新领导层关于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上述重要表态，密集程度罕见，且用词严厉。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央对薄熙来、刘志军等人问题的查处就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反腐败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再次向全党同志发出了“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号角。

腐败这一几乎与人类文明社会相伴生的毒瘤，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其危害尤其明显。在政治方面，腐败削弱

乃至破坏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从根本上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然而，腐败的滋长和蔓延损害党的形象，损害官员的形象，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造成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极大不满。在经济方面，腐败动摇着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任何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腐败行为归根结底都要与经济挂钩。贪污、受贿直接是为了金钱；奢侈浪费、大吃大喝造成了大批资金的严重浪费。而腐败背后造成的竞争不公正和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则更直接地危害社会经济。在思想文化方面，腐败严重毒害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腐败的盛行逐步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一旦形成文化，就会渗透到一些人的思维习惯和日常行为模式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深处，对社会风气和人们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腐败严重污染着人们的思想文化，污染社会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败不仅仅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严肃的文化角力。从党的自身建设看，腐败侵蚀党的先进性，削弱党的战斗力。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少数人的腐败行为是对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亵渎，严重毒害党内风气和党员思想，造成一些党员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的颠倒，思想混乱，灵魂空虚，不能发挥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腐败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削弱，一些党组织内歪风邪气盛行，组织涣散，派性发作，纪律松弛。从加剧社会矛盾方面看，腐败行为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极大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败坏了社会良好风气，挥霍了大量社会财富，引起人们的不满，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当前许多重大事故背后往往都有腐败的影子，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成为目前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近几年来，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行业、单位乃至个人的层面都提出了各种反腐败的方案，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依法依纪严厉惩处了大批腐败分子，加强了反腐

倡廉的制度建设，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然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并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一是群体化。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经济上相互牵连，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窝案、串案、案中案增多，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案犯职高、权重、影响大，越来越多的部级官员因腐败被调查处理。三是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四是腐败手段和方式趋于多样化，形式和过程更加隐蔽。除露骨的钱权交易外，还通过股票发行、企业破产、重组等方式侵占国有资产，或通过赞助、赠与、资助等方式行贿受贿。五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特点。六是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金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收受贿赂和好处。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严峻的腐败形势？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对产生腐败的原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找到真正的症结，才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笔者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组织指挥侦查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和腐败案例，在工作中也不停地观察和思考，探究腐败的原因和反腐败的出路，并根据亲身工作经历及近年研究学习，对腐败原因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应当从人性、权力、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对腐败进行分析，才能客观全面深刻揭示腐败的原因。据此，本书从四个方面的视角探寻腐败的根源：

第一，人性的某些弱点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人性是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属性。关于人性的本质，中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观念。西方国家持人性本恶

的思想，中国哲学则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人性本善的思想。这些理论假设或者思想对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和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传统的性善论，使我们在制度设计中过多地寄希望于人格修养，强调道德说教。而以人性恶为前提的西方，强调以制度牵制人的私心，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无论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不可否认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都受到内驱力、需要、诱因等多方面的影响。人一旦对这些因素掌控不好，就走向腐败的轨道。而这些因素是一个人走向腐败的内因，是根本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对政治进步期望过高，权欲思想严重，拜金主义严重，私欲极度膨胀；对性过度需求，生活腐化堕落；扭曲的人情关系；为亲情所累，公权用于谋私，等等。

第二，权力是腐败的前提。笔者从权力学说的历史起源、权力的特征及权力腐败的案例中寻找腐败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权力的运行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由于权力具有强制性、价值性、工具性、扩张性、可交换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权力容易异化。权力本来是因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产生并为人民服务的。但在权力运行中却由于权力的特征而扩张、突破，最后权钱交易，成为腐败的运行规律。由于权力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决定了权力腐败是导致社会各个领域腐败产生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遏制腐败就必须建立监督和制约权力的社会体制机制。

第三，制度是腐败的条件。所谓制度，是指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要求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关于制度的作用，邓小平做过深刻的论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贪污腐化、

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的问题屡禁不止。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根本在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导致对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对于普遍出现的腐败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防止腐败也必须从制度着手。

第四，文化是腐败的土壤。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所有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也侵染着我们每一个人，从而成为个人走向腐败的温床和土壤。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有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腐败现象亦是如此。社会文化中一些腐败成分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因素。腐败行为是腐败意识的外化，腐败意识的产生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同时腐败意识积聚又会加重这种文化氛围的发展蔓延，相互作用，从而使腐败愈演愈烈，人们从不适应到适应，从适应到习惯，到不自觉地加入腐败的行列。这种腐败文化在我国当今的社会意识中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但它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中国社会中，腐败文化主要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本位，即以做官为根本。衡量人的成就、人生的价值，计算人的收入、待遇，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均以是否为官、官之大小为根据。还有红包文化、情本位文化和重内省、轻制度文化等，这些文化，使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并实施腐败行为。综观目前我国反腐败面临的形势，可怕的正是腐败现象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腐败文化。腐败借助文化传播的社会性，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延伸和渗透，并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消极效应。若干历史史实表明，社会上存在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文化的形成。只要腐败文化存在，仅仅是惩处一些腐败分子，而不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荡涤腐败文化，反腐败就会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低级阶段，甚至出现腐败越反越多、越反在群众中的威信越下降的现象。因此，反腐败绝不单纯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领域的较量，反腐倡廉建设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要防止腐败，不仅要对腐败行为进行有力的打击和进行

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还要消除腐败文化，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意识的产生和蔓延，铲除腐败的温床。

针对上述原因，笔者提出了惩治和预防的对策。对权力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权力不仅仅可以为人类谋福利，也可能被用来贪污腐化，进行权钱交易。因此，必须树立监督意识，用权力制约权力、用权利制约权力、用制度制约权力、用伦理制约权力。对人性要有深刻的认识，要加强教育，引导人们控制自己的需要，合理满足自己的需要，坚决克服不合理的需要。在加强思想教育，合理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要对人性的缺陷有足够的认识，用伦理、制度、法律等形式来防止人性弱点的暴露。由于制度在腐败产生的原因中的重要性，必须重视制度建设，用制度反腐败。消除腐败，还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向是社会公众，通过文化建设形成对廉政行为的普遍认同和社会评价，创造一种社会氛围和压力机制，使权力使用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反腐败斗争既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文化斗争。要反对腐败，就必须反对腐败文化；要铲除腐败，就必须铲除滋生腐败的文化根基。

目 录

CONTENTS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人性篇 (1)

| | |
|------------------------------|--------|
| 一、人性善恶与腐败产生的根源..... | (2) |
| (一) 性善论 | (2) |
| (二) 性恶论 | (4) |
| 二、人性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 (5) |
| (一) 权欲思想严重，对政治进步期望值过高 | (8) |
| (二) 拜金主义严重，私欲极度膨胀 | (10) |
| (三) 对性过度需求，生活腐化堕落 | (12) |
| (四) 扭曲的人情关系是产生腐败的又一个根源 | (15) |
| (五) 为亲情所累，公权用于谋私 | (20) |

第二章 权力篇 (24)

| | |
|---------------------------|--------|
| 一、中西方权力起源学说..... | (25) |
| (一) 中西方权力起源学说的背景 | (25) |
| (二) 中西方权力起源学说对政治的影响 | (26) |
| 二、权力的运行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 | (28) |
| (一) 权力的强制性 | (28) |
| (二) 权力的价值性 | (29) |
| (三) 权力的工具性 | (29) |
| (四) 权力的扩张性 | (30) |

| | |
|----------------------------------|-------------|
| (五) 权力的可交换性 | (30) |
| 三、发生在社会各领域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例 | (32) |
| (一) 党政机关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例 | (32) |
| (二) 司法机关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例 | (33) |
| (三) 土地工程房产领域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例 | (37) |
| (四) 海关领域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例 | (39) |
| (五) 工商领域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例 | (40) |
| (六) 教育领域权力腐败案件 | (41) |

第三章 制度篇 (44)

| | |
|----------------------------|--------------|
| 一、制度的基本内涵 | (44) |
| 二、政治制度与反腐败 | (45) |
| (一) 西方权力制约思想及三权分立制度的形成 | (45) |
| (二) 社会主义议行合一制度的形成 | (48) |
| (三)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 (50) |
| 三、制度设计的优劣是腐败是否能够得到遏制的关键 | (54) |
| 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堵塞制度漏洞 | (57) |
| (一) 公共权力配置失当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58) |
| (二) 公共权力监督体制不到位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 (63) |
| (三)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含有用人腐败的诱因 | (66) |
| (四) 司法制度与机制漏洞为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 (68) |

第四章 文化篇 (71)

| | |
|---------------------|--------|
|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 | (72) |
| (一) 中国传统的静止与西方的运动 | (74)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与西方的斗争 | (75) |
| (三) 中国传统的性本善与西方的性本恶 | (76) |

| | |
|---------------------------------------------------|--------------|
| (四) 中国传统的整体本位与西方的个体本位 | (77) |
| (五) 中国传统的模糊与西方的精确 | (78) |
| (六) 中国传统的人治与西方的法治 | (79) |
| 二、传统观念是腐败产生的文化因素..... | (80) |
| (一) 封建遗毒“官本位”文化的危害 | (80) |
| (二) 礼仪变异的红包文化助长腐败 | (82) |
| (三) “情本位”的关系文化的负面效应 | (84) |
| (四) 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官员的制约 | (86) |
| (五) 腐败分子自身的人格因素导致腐败 | (88) |
| (六)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的影响 | (92) |
| (七) 个体本位的边缘文化动摇干部信念 | (92) |
| 第五章 惩治与预防篇 | (96) |
| 一、中西方廉政思想比较..... | (96) |
| 二、中国古代及国外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措施..... | (99) |
| (一) 中国古代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措施 | (100) |
| (二) 国外防治职务犯罪的有益借鉴和启示 | (101) |
| 三、对我国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和建议..... | (109) |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增强人民 群众参与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 (109) |
| (二) 充分认识权力的特征，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 (111) |
| (三) 加强教育，引导人性中有利干防止腐败的因素 更加充分发挥作用 | (115) |
| (四)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 (115) |
| (五) 建立一系列新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 | (120) |
| (六)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防范贪官 外逃、境外追逃追赃工作 | (126) |
| 后 记 | (129) |

| 第一章 |

人性篇

纵观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特权和腐败现象。腐败早已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和现实性的客观问题。从腐败的表现特征来看，尽管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腐败这个与人类文明社会几乎伴生共存的政治毒瘤，应该说还是有其产生原因的。

从古至今，腐败问题产生的其中一个共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自身人性的内在冲突，人性弱点的普遍性。人性是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根源的表现就在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内在冲突。这一冲突具体表现为人的自然需要和欲望的无限性与社会现实生活条件的有序性、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内在冲突中，人们才逐渐产生出所谓“善”、“恶”之观念。在现阶段，对人性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权力与腐败的关系，这对有效遏制腐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试图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腐败

产生的人性根源。通过对腐败原因的人性分析，加强公众教育，对政府行政监督，为政府综合性监督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一、人性善恶与腐败产生的根源

人类有史以来，除了对大自然的规律进行研究、改造获得物质财富外，一刻也未放松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自身发展及变化的规律，并不断获得精神的财富。尤其是对人性善恶的争论持续了数千年，逐步在西方形成了人性本恶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后来西方政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人性本善的观念，这一观念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对我国封建伦理观念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思想家们正是从对人性的分析和对人类经验的观察中引申出政治原则。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约束和协调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都隐含着对人性的规定性以及人的行为取向的某种主观预期和理论假设。这种预设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权力规范建构的思维方式以及制度选择的可能性空间。

（一）性善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代的哲人就围绕人性的善恶问题展开过大辩论。引起人性大辩论的是孟子，他针对告子提出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基本命题。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不以为然，认为人性不能理解成“饮食男女”一类的本能，因为这些本能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先天的道德观念，生而具有善端。《孟子·公孙丑上》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

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虽然认为人性本善，但并未否认后天因素使人不为善的可能性。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的观点是后来由荀子提出的“性恶论”。荀子在《荀子·性恶》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这种观点被看作中国文化的异端，韩愈的《原道》不提荀子，不列其人道统，宋明理学不承认荀子，正统的儒学认为荀子是离经叛道，是异端。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正统地位的人性论思想是亚圣孟子的性善论。其人性本善的思想被士大夫文化和民众社会文化全面认同。董仲舒、王弼、郭象、韩愈、李翱、二程、朱熹、王守仁，甚至佛性说，尽管他们在具体阐述或说法上各有差别，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都是对人性善理论的认同。在大众文化层面，《三字经》这一民间通俗文化的第一文本的首句教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历代以来，人们追求并相信能实现“君子国”、“大同世界”，期盼明君与清官来拯救社会和自己，相信世上总是好人多。这些也都反映了性善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学者认为人的本性善良可信，通过自身的修养、内省等，只要火候一到，都可成为圣贤。因此，良心、道德足以治国，足以管理社会。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带有严重的局限性的。儒家的幼稚性就在于它不是沿着完善社会制约规范而努力去做，而是不切实际地去消除外在规范（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企图建立一个完全道德化的社会。儒家把道德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一切知识全都沦为道德的奴婢，形成了泛道德主义。所以，中国传统的性善论，使得我们在某些制度设计中，倾向于将制度的希望寄予人格修养，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然而，对人们社会行为的防范如果仅仅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仅仅诉诸于道德说教，诉诸于人们的良心自觉，往往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现代法治社会绝不可能建立在“性本善”的价值信条上，不能过度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法律从根本上来讲是阶级意志的体